



1月10日,来自全国的10余位顶尖历史、考古、军事专家学者齐聚重庆合川钓鱼城下,他们触摸着冰凉的砖石,翻阅着泛黄的史料,试图解开重重谜团:钓鱼城究竟如何以弹丸之地抵挡当时世界最强的蒙古铁骑36年?城墙之下,是否隐藏着一个更庞大的防御体系?在南宋灭亡后,它又为何能奇迹般免遭屠城厄运?



钓鱼城护国门

1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合川探寻未解之谜 钓鱼城守军让蒙哥汗殒命 最后为何能免遭屠城厄运

一块青灰色的宋代墙砖上,深深的凹痕仿佛还在诉说700多年前的撞击——那是蒙古大军投石机留下的印记。旁边,考古人员新近清理出的排水沟设计精巧。在合川钓鱼城的断壁残垣间,这样令人惊叹的历史细节比比皆是: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铁雷碎片、被时光磨平了浮雕的筑城砖、神秘莫测的攻守地道……

1月10日,这些沉默的“见证者”终于等来了最懂它们的倾听者。来自全国的10余位顶尖历史、考古、军事专家齐聚钓鱼城下,为即将由央视精心打造的6集纪录片《钓鱼城:撼动历史的传奇》提供智力支持。

这场钓鱼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,恰似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当专家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山河水系,当他们的争论声回荡在古战场上空的冬日雾气中,那段尘封的、撼动过世界的历史,正从碎石与文字间,一寸寸苏醒过来。

1

“36年,不是奇迹的偶然,而是智慧的必然”

“守军竟敢主动出击?他们在夜色掩护下,顺着我们白天才发现的密道,直插大营核心……”国防大学教授薛国安打开电脑上的地图,手指一点,将与参会者拉回到南宋淳祐十二年(1252年)的那个深夜。

这次经典的偷袭战,只是钓鱼城36年漫长战史中200余次大小战斗的缩影。这场持续36年的战役,远非一次简单的“围城”,而是一首波澜壮阔、战术变幻的军事史诗。

“36年,不是僵持,是三个阶段的生死博弈。”薛国安将这场持久战清晰解

剖。

第一阶段(1243—1257年),蒙军凭借绝对兵力优势发起“间歇性强攻”。面对蒙古铁骑的冲击,钓鱼城守军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与智慧。他们凭险守城,利用悬崖峭壁消耗敌军;更“以步制骑”,在山地地形中化解了蒙古骑兵的最大优势。

这一阶段的胜负手,在于守军并非被动挨打,而是灵活出击。如1243年的“大小三十六战”、1246年的击退来敌,尤其是1252年那次成功的夜间突袭,重创蒙军大营,打出了守军的锐气。

第二阶段(1258—1259年),战事升级至最高潮。蒙古国大汗蒙哥御驾亲征,想一举拔掉这颗“钉子”。薛国安描述,蒙军采取了残酷而系统的战术:先是扫清外围城堡,将钓鱼城变为“孤城”,继而发动潮水般的总攻。

最危急时,蒙军将领汪德臣甚至率精锐夜登外城,一度杀人钓鱼城马军寨。然而守军在王坚指挥下,军民联手顽强抵抗。

转折点发生在1259年7月,狂傲的汪德臣单骑至城下劝降,被城上飞石击毙;不久,御驾亲临前线的蒙哥汗也重伤身亡。大汗殒命,震动全军,远征亚欧多地的蒙军战略性撤退,世界历史为之改写。

第三阶段(1260—1279年)，“围困与反围困”的较量。即位的忽必烈转变策略,从强攻改为久困,然而钓鱼城依然“攻守相持”。

守将张珪以攻为守,多次主动出击,袭击元军粮道与据点,直到1279年南宋全境已降,钓鱼城彻底成为怒海中的孤岛,在得到不屠城的承诺后,为保全一城军民,才最终议和归降。

“36年,不是奇迹的偶然,而是智慧的必然。”薛国安总结道,钓鱼城的坚守,是“山水一体”地利、“耕战一体”后勤、“军民一体”人力、“攻守一体”战术、“内外一体”策应以及“智勇一体”精神的完美融合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城的胜利,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极端劣势下,将防御战打成主动战、将消耗战打成精神战的教科书。

2

“和平结局”揭示了背后的权力博弈与人道抉择

抵抗了36年的钓鱼城守军,在南宋灭亡后开城归降。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:按照蒙古军队的惯例,对抵抗如此顽

强的城池,往往会进行屠城报复,更何况钓鱼城还是蒙哥汗的殒命之地。为何钓鱼城军民却能幸免于难?

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,揭示了这场“和平结局”背后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与人道抉择。

当时元朝在四川设有东、西两个行枢密院,东院负责直接围攻钓鱼城,西院则镇守成都一带。由于钓鱼城军民曾击败蒙哥汗,东院将领(其中甚至有人曾是蒙哥的亲随)怀恨在心,坚决主张屠城。而钓鱼城守将王立深知向东院投降凶多吉少,于是秘密联系了西院副枢密使李德辉。

转机出现在一位关键人物——安西王忙哥剌(忽必烈之子)身上。当时,忽必烈派安西王出镇西北,其势力范围涵盖陕西、四川等地。安西王出于稳定大局、树立仁政形象的考虑,更倾向于招抚。在他的干预下,李德辉得以介入,并向王立承诺“许以不杀”。

最终,王立率众向西院投降。但风波并未平息,东院官员随后向忽必烈诬告李德辉“越境邀功”,并再次要求诛杀王立。关键时刻,又是安西王出面阻止。尽管安西王不久后去世,王立一度被囚,但最终忽必烈在近臣劝谏下醒悟,赦免王立并授以官职,钓鱼城军民得以保全。

“这个故事有很多层次。”周思成总结说,“从高层来说,王立和钓鱼城军民的生死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蒙古高层的权力博弈;从微观来看,这么一个角落的钓鱼城,竟然也牵涉到忽必烈时代宗王出镇与朝廷官僚体系的复杂关系。”

周思成认为,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王立等人保全一城军民的勇气与智慧,也反映了元朝统治策略的转变——从早期的血腥征服,转向注重招抚与治理。而这,也正是钓鱼城故事中最具人文光辉的一页。

3

钓鱼城不是孤立城堡,而是庞大防御网络中的关键节点

跳出对单一城池的关注,钓鱼城的故事还有更宏大的叙事维度。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钓鱼城本身时,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副教授李震却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天地。“我们主要致力于从文化景观视域下,对长江上游宋元防御性山城体系的演化和动力机制进行研究。”她讲述的,是一个“体系化”的钓鱼城故事。

什么是“文化景观视域”?李震解释道,这是指将自然与人文视为一个整体,强调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。在这一视角下,钓鱼城不是孤立的城堡,而是庞大防御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
李震介绍,长江上游的宋元防御性山城体系,包括南宋修筑的43座和元军修建或改造的7座,总计50座山城,分布在今天的川、渝、黔地区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防御网,而钓鱼城正是这张网中的“二级中心地”(一级中心地为重庆)。

“山城体系不仅是军事设施,更是一种文化景观。”李震指出,这些山城大多依山傍水而建,充分利用自然地形,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智慧。同时,它们兼具“线路文化景观”特征,通过水路和陆路相互连接,形成一个有机整体。

研究这一体系有何意义?李震认为,这不仅揭示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建筑智慧,更能深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理解。她举例说,山城体系的建设与运作,往往涉及“正规军与地方武力协同”,守城和攻城双方都包含多民族成分,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。

然而,研究也面临挑战。李震坦言,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山城,缺乏体系层面的整体性分析;考古资料虽丰富,但多停留在文字与二维记录,缺乏三维建模与系统性整合;各省研究也相对分散,未能形成合力。

对此,李震提出未来研究方向:应加强跨学科合作,引入地理信息系统、三维建模等技术,进行数字化复原;同时开展跨区域联合研究,探索山城体系的整体演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。

“山城体系的文化景观价值,不仅在于它的过去,更在于它对今天的启示——如何实现人与自然、文化与战略的和谐统一。”她说。

研讨会上,专家们的真知灼见,勾勒出了钓鱼城的历史形象:它既是一座展现古代中国军事智慧与坚韧精神的英雄之城,也是一个庞大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,更是一面映照出战争与和平、权力与人性复杂关系的多棱镜。

研讨会虽已落幕,但对钓鱼城的探索远未结束。正如专家们所言,钓鱼城的价值阐释、保护利用、文化传承,仍需持续深耕。这座屹立于三江之畔的古城,依然藏着许多等待被破解的秘密,而每一次解读,都是对中华文明韧性与智慧的一次深情回望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



钓鱼城守将之一王坚塑像